

山东通史

安作璋 主编

当代卷·上册

当代卷

山东通史

安作璋 主编

当代卷·上册



本卷主编

刘德军

刘芳

人

民

水

版

社

《山东通史》序一

历经数年的艰辛劳动，山东史学界的有志之士，终于编纂完成了《山东通史》这部传世之作。地方通史，起源于古代鲁之《春秋》。史学家们认为：著史，包括编纂地方史，其目的在于“龟镜将来”。也就是说，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把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办得更好。我以为，《山东通史》的编纂目的也在这里。

一个省份或地方，作为国家的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形成和表现出自己的区域特征。这是国家通史不能取代的研究领域。山东的区域特征，可以追溯到半岛先民们生息的原始社会。但山东区域特征的形成，当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山东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区域之一，形成了自己在当时颇具特色、颇有影响的齐鲁经济文化形态。齐鲁文化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结合的产物，但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完全相同，如齐文化开放，鲁文化持重；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崇伦理；齐文化重革新，鲁文化尊传统，等等。齐鲁文化结合互补，扬长避短，相辅相成，使之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齐鲁文化虽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逐渐消失，与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洪流之中，但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却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国家多次沦入割据战乱，山东是主战场之一，山东人民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而日趋衰落。但齐鲁文化仍能利用自己的传统优势，以它那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和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一方面通过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吸收融合了北方草原的

游牧文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大批汉族士民的南迁，向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输入中原滨海的先进文化，从而丰富发展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了隋、唐、明、清几个盛大的统一的封建皇朝。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入侵，山东作为沿海省份而首当其冲。可以说，入侵中国的外敌，没有一个不染指山东的。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除继续加剧山东的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状态之外，那就是极大地唤起山东人民的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觉醒。《山东通史》就山东的区域特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开掘，应当说是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山东通史》的编纂和出版，负有“当国之龟镜”的重任，它理应唤起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科学地认识山东，开发山东，把山东重新推上祖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驱。它理应唤起山东人民的正确的自我意识、使命意识，奋斗不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去重新书写新一代山东人的光辉历史。

苗枫林

1992年4月

《山东通史》序二^①

山东，古称“齐鲁”。齐鲁是西周在今山东地区建立的两个最大的封国，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仍以“鲁”作为山东省的简称。“山东”一名，在历史上出现也很早。战国时代，秦据关中，即称崤函以东的六国为关东或山东。如战国时人的著作《管子·轻重戊》称楚为山东之强国。汉初贾谊写《过秦论》也曾多次提到山东。一则说“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再则说“山东大扰”、“山东豪俊”、“山东之国”等等，这些都是沿袭当时人的习惯用语。不过那时所谓山东，范围很广，并不是专指今天的山东。正如清人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一所说：“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秦汉大一统局面出现以后，关中与山东在政治上对立的状况逐渐消失，山东一名也开始出现广狭二义。其广义仍指崤函以东或太行山以东；其狭义则与今之山东大体近似。《史记·酷吏列传》载御史大夫（公孙）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指为薛狱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又《儒林列传》云：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则齐鲁之号山东，应自此始。

至于山东作为一级行政区划，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山东的历史沿革，夏、殷以前不可详考，西周、春秋时，山东属齐、鲁、曹、滕、薛、郑、莒及宋、卫国的一部分。战国后期属齐，其南北各一部分属楚、赵。秦统一以后，在山东先后分置齐郡、琅邪、胶东、济北、东海、薛郡、东郡等

① 此序为原书“前言”，为与增订本各分卷“前言”有所区别，改为“序二”。

郡。楚汉之际，分为三齐（临淄王田都、胶东王田市、济南王田安），不久为汉所并。汉代郡国并行，西汉初，山东大部分地区为刘邦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封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初置十三部州，山东分属青、兖、徐三州。青州领平原、千乘、济南、齐、北海、东莱六郡和淄川、胶东、高密三国；兖州领东郡、山阳、济阴、泰山四郡和城阳、东平二国；而琅邪、东海二郡及鲁国，则属徐州。东汉时，山东属青、徐、兖、豫（鲁国划归豫州）四州，三国魏略同于东汉。西晋初，山东分属青、徐、兖、豫（统鲁郡）、冀（统平原、乐陵）五州。晋怀帝永嘉（307~313）之乱以后，山东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南燕所据有。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刘裕平南燕，复置青、兖、徐三州，后又置冀州，治历城。其后，山东地方为北魏所有，魏亡属北齐，寻又为北周所并。隋统一后，又恢复十三部州，山东分属青、徐、兖、豫四州。唐贞观初，分全国为十道，河、济以南属河南道，以北属河北道。北宋改道为路，分全国为二十四路，山东分属京东东路、京东西路。金大定八年（1168）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治益都。至此，“山东”一名始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划。元朝分置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直隶中书省，称为“腹里”。明洪武元年（1368），置山东行中书省，治青州。九年，移治济南，又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直到清代，始将山东政区的名称正式定为山东省。此后一直沿袭不变。

（一）

山东地方和全国各地一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制社会，属于原始公社末期的大汶口文化就是在山东首先发现的。根据文献记载，远古时代的山东是东夷族居住的地方。所谓“夷”在那时并不是一个贬义词，那时的“夷”和现在人民的“人”本为一字，由于东方和西方语音不同，西方念人，东方念夷（至今胶东一带仍保留这种古老的语音）；又夷族在狩猎的经济生活中锻炼出一种很高的射箭技术（如传说中的名射手后羿就是夷人），所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在古书上有时夷族也被称为“人方”，就是因为夷和人本为一字的缘故。

东夷是夷族的总称，其中还有许多支族，如莱夷、鸟夷、根牟等。东夷

各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鸟为图腾（Totem）。如东夷族的一个著名首领太昊氏（即伏羲氏），风姓，“风”即凤鸟之“凤”；另一个首领少昊氏“以鸟名官”。有的支族更是直接以鸟命名，如鸟夷。所有这些，都是崇拜鸟图腾的证据。鸟图腾不但是东夷各族的普遍现象，并且在渤海沿岸和朝鲜半岛上的远古居民中也很流行。如《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也说商的始祖契是其母简狄吞玄鸟（燕）卵而生。这些都是有关鸟图腾的传说。这里假使不能断定这些地区各族间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话，那么，至少也可以证明各族间很早就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他们共同创造了黄河下游渤海沿岸的历史和文化。

从传说看来，夷族中有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除上面提到的太昊氏、少昊氏以外，还有关于虞舜、伯益等人的传说。舜是大家所熟知的。传说他原来居住在山东。《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卒于鸣条（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①《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耕于历山（济南），渔雷泽（兖州），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曲阜）。”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舜出生在山东，属于东夷族，他的活动大部分也在山东。孟子、司马迁等人去古不远，对于古代传说，如果没有一定根据，是不会轻易相信的。春秋初年，舜的后代遂国（今山东肥城境）还存在于山东，也可以作为舜原居山东的一证。

关于舜的文献记载很多，即如上述，虞舜时代的农业、渔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尤其是制陶手工业，更是远近闻名。反映虞舜时代的考古资料，即是举世闻名的龙山文化。从龙山时代遗址发掘中可见，文明的诸要素已经具备，一是代表新的生产力水平的金属冶铸业和金属工具的出现；二是标志贵族身份等级的大墓与礼器的发现；三是已发现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四是发现了最原始的文字陶文。龙山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已进入夏朝的积年范围。中国先秦古籍都说夏朝的创始人禹是舜的臣，后来舜让位于禹；《左传》、《国语》、《礼记》等书又往往把“虞夏”或“虞夏商周”并列。这一切都说明虞舜时代

^① 古地名加注，今地名详见《先秦卷·通纪》53页注。古人里籍及活动地往往有不同说法，本书只能采取一种说法，兼注他说，下同。

已进入人类的文明时代，并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虞舜王朝。

从远古传说到地下发掘，都在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处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是中华民族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早期文明起源地之一。我们的祖先曾经在这里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的原始公社制生活。从虞舜时代算起，迄今也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

继虞舜之后，夏朝的历史，特别是夏朝前期的历史也和山东地方有密切的关系。那时候，黄河下游地区，洪水经常泛滥成灾，为了共同和洪水作斗争，从中国西部东迁的夏族和原住在山东地方的夷族结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首领分别由夷、夏两族轮流担任。禹治水有功，舜让位于禹。禹在位时，益治水有功，并发明凿井术，禹又准备让位给益。可是禹死之后，这时夏族部落贵族的势力已很强大，他们破坏了这个民主选举的传统，禹子启杀死伯益，自立为王，建立了夏朝。从所谓“尧舜禅让”到“禹传子，家天下”，从氏族民主选举到王位世袭，正是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从启杀益自立以后，夷夏关系破裂，彼此之间曾经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从“太康失国”直到“少康中兴”，夏的政权曾一度落到夷族首领有穷氏后羿和寒浞手里，有穷氏在今山东德州北，寒浞在今山东潍县东北。少康的复国也主要是依靠夏族在山东的势力而取得最后成功的。《史记·夏本纪》中所提到的夏的同姓国和与国，绝大部分都在山东，如有鬲氏在今山东德州，有仍氏在济宁，斟戈（灌）氏在寿光东北，斟寻氏在潍县西南，费氏在费县，缙氏在苍山，杞氏在安丘，莘氏在曹县，观氏在观城，顾氏在莘县。由此可见，这时夏的势力中心在山东，且已深入山东东部。基于上述情况，如果说，夏朝是我国早期的奴隶制国家，那么，就得承认山东地方就是这个奴隶制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夏朝而起的商朝，和山东的关系更为密切。前述商族对鸟的崇拜，即说明商族与东夷族有可能属于同一族源。又据传说，商的始祖契都于蕃（今山东滕县），相土东都在泰山下，汤都于亳（今曹县境内），也说明汤以前的商族活动中心在山东。

山东不仅是商族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商朝统治势力的重要根据地。一直

到商亡后，商的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在山东；并且在不久以后，纣的儿子武庚还联合山东的旧属国蒲姑（今山东博兴）、奄（今山东曲阜）起兵反周，严重地威胁着周的统治。周公集中全部力量东征，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平定了这次叛乱。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于是在山东建立了诸侯：封姜尚做齐侯，都营丘（临淄）；封伯禽做鲁侯，都曲阜；封振铎为曹侯，都陶丘（定陶）；封綏为滕侯，都滕。此外，又封康叔做卫侯，占据原来商都朝歌及邻近（包括山东西南部）地区，并长驻八师兵力，以监视山东的动静。姜尚，就是后人所称的姜太公，他有大功于周室，是周武王得力的助手；伯禽是辅佐成王的周公旦的儿子；曹、滕、卫等都是成王的叔父，这些封国，尤其是齐鲁两国的建立，标志着奴隶制国家在山东的一个新的发展，对以后山东地方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秦汉以前，在没有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以前，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候，各地区的进程也很不一致，有早有晚。按照目前史学界一种说法，我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其绝对年代，据《史记·六国年表》，划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但是具体到山东地方，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初税亩”，在鲁国已出现了新的封建关系萌芽。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亦即孔子《春秋》绝笔之年，齐国的田常杀齐简公“专齐之政”（《史记·齐太公世家》），从此田齐代替了姜齐，成为当时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个封建大国。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封建皇朝，齐是最后被灭的一个诸侯国。自此以后，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山东地方虽有时也曾为割据势力所盘踞，但总的来说，则是属于历代封建皇朝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见前述，不再重复。

（二）

自古以来，山东地方就以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著称于世。根据地下发掘，我们知道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在山东创造黑陶文化的人们就已经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传说大禹治水，主要活动地点就在今兖州一带（嘉祥县武氏祠汉代石刻画像中有大禹执耒图）。由于居住在山东的以伯益为首的东夷

族的帮助，终于平息了水患。山东处于黄河下游，河水经常泛滥为灾，山东人民为了克服水患，保证农业生产丰收，跟黄河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规模较大的一次，是汉武帝时候黄河在山东与河北交界的馆陶决口，山东人民总结了历年治黄的经验，在决口处顺水势开凿了一条与黄河深宽相等的屯氏河，自馆陶向东北流入海中。这次治河保持了大约60多年山东地区没有遭受大的水灾。同时，通过历年治河，山东也出现了不少治水专家，如武帝时关中的漕渠，就是在齐人徐伯主持下开凿的，“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而渠旁之民又得用以溉田。另一位齐人延年曾上书武帝，建议“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此功一成，万世大利”。“书奏，上壮之”。（《汉书·沟洫志》）因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实行。又一次治河工程是东汉明帝时，在水利家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王景及其助手王吴等人的领导下，山东人民参加治河的有几十万人，自河南荥阳至山东千乘（今高青东北）海口1000多里之间，修筑了许多堤防、闸、堰，限制河水在一定区域内流行，使黄河一直保持了大约800年之久没有发生大的水患。明代会通河的修治工程，规模也很大，自济宁至临清380余里之间，16万山东民伕在汶上老人白英指挥之下，“引汶济运，调节水量”，终于使运河南北航运顺利通过这一脊梁地带，不仅解决了漕粮运输问题，而且也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外，水利灌溉事业也很发达。西汉时，东海引钜定泽（今名清水泊，在寿光西北），泰山下引汶水，各溉田万余顷。琅邪郡的稻县（今山东高密西南）蓄潍水溉田，旁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号称“万足（雅）梁”。唐代密州的潍水堰、高密的夷安泽，也都能灌溉上万顷的田地。至于垦田面积，史书缺略有间，据官书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山东民田已达10余万顷，占全国第三位；清康熙年间又增至90余万顷，这大概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最高数字。

山东滨海，自姜太公建立齐国，即开发渔盐之利。战国秦汉时期，山东的煮盐业已有很大的发展，鲁之猗顿、齐之刁间皆以煮盐起家，富比王侯。汉武帝时在全国设立盐官35处，山东即有11处。唐朝棣州有蛤蜊盐池，年产盐数十万斛（石），唐朝政府在淄、青、兖、郛等州设立盐院，仅在穆宗长庆二年（822）所收盐税即达70万贯（1000钱为一贯）。北宋初，在山东设立盐场三处：一处登州（产量不详）；一处密州，年产32000余石。

(每石 50 斤); 一处 在滨州, 年产 21000 余石。神宗元丰三年 (1080) 实行专卖, 收入达 273000 余缗 (同贯)。明初, 山东沿海地区辖 19 个盐场, 岁办大引盐 143300 余引 (大引 400 斤, 小引 200 斤)。这些简单的记录, 已足以说明山东煮盐业的发达。

据《国语·齐语》记载, 春秋初年, 齐国已开始用铁制造农具 (实际上可能还要早些)。“铁”字古文作“𦍋”, 从字的构造上说明铁可能是山东的夷族最早发明的。解放后发现的齐叔夷钟, 上有铭文提到齐灵公赏赐叔夷莱夷造铁徒 4000 人, 足见当时冶铁规模之大。战国时, 冶铁工人已积累了较丰富的采矿知识, 据说山上发赭色, 下面就有铁。西汉时, 鲁之曹邠即以冶铁“富至巨万”, 闻名全国。汉武帝在全国设置铁官 48 处, 而山东就有 12 处。唐朝的兖州是矿冶中心, 莱芜有铁冶 13 处, 铜冶 18 处。安史之乱后, 李师道据兖、郛、淄、青、濮五州, 仅矿冶一项, 每年即营利百余万贯。北宋时, 莱芜铁冶规模更加扩大, 与江苏利国监同为京东路两大冶铁中心。宋朝政府设莱芜监, 管理铁冶 18 所, 铁坑 3 处。神宗元丰年间 (1078~1085), 莱芜铁年产量为 190 余万斤。明朝初年, 山东年产铁为 3152187 斤, 仅次于湖广、江西, 占全国第三位。

山东的其他矿产也很丰富。宋朝登、莱二州产金。据时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方物”条记载:“登、莱州产金, 自太宗时已有之, 然尚少, 至 (仁宗) 皇佑中, 始大发, 四方游民, 废农桑来掘地采之, 有重二十余两为块者, 取之不竭。”神宗元丰元年 (1078), 全国总收金 10710 两, 其中登州 4701 两, 莱州 4872 两, 占全国 90%。明初, 济南、青州、莱州三府岁采铅 322400 余斤。清朝山东的煤矿已开始大量开采, 最著名的是峰县煤矿, 乾、嘉时期, 北运京师、奉天, 动辄数百万石, 本县的梁氏、崔氏、宋氏皆以此起家, 富比王侯。

山东的纺织手工业是举世闻名的。战国时代, 齐国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临淄、定陶、亢父 (济宁) 是汉代三大纺织手工业中心。汉朝政府在临淄设有齐三服官, 各有纺织工数千人, 岁费万万。纺织品不仅生产数量多, 而且质量也很高。就种类来说, 有“冰纨、绮绣、纯丽之物”; 就花纹来说, 有各种不同的美丽图案。汉人史游《急就篇》说, “齐国给献素缁帛, 飞龙凤凰相追逐”, 可见纺织手工的精巧。山东的纺织品销路很广, 不

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国外。20 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Stein）曾在敦煌发现任城亢父缣，上面还有题字：“任城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尺，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敦煌是汉代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可见亢父缣是一种外销的纺织品。如果把西安作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那末其主要源头则在山东。差不多同时期，在今朝鲜平壤一带古坟中也发现了带有“元始”（西汉平帝年号）、“永平”（东汉明帝年号）等字样的漆器、铜器和大批丝织品残片，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绶绢碎片，织工精细，与齐地出土的衣服毫无差异，显然是通过海路传入朝鲜的。这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也在山东。唐、宋时期，山东的纺织业更为发达，唐代大诗人杜甫和李白都曾把他们亲眼见到的情景写入诗中。如杜甫的《忆昔》诗：“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李白的《答汶上翁》诗：“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那时候，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纹绫，都是驰名全国的纺织品。宋朝在青州设立织锦院，专门织造高级丝织品。此外，登、莱的端布，沂州的沂布，也很有名。宋神宗时，在山东“和买”绢帛，每年达 30 万匹左右。明清时期，济南、济宁、临清等城市都有较发达的丝纺手工业，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这些都反映了山东纺织手工业发展的盛况。

大约在一四五千年前，山东人民就创造了光辉的黑陶文化，章丘龙山镇出土的黑陶漆黑发亮，表里光滑，壁如蛋壳，所谓“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壳”，受到中外考古学家的赞扬。汉代所产的绿釉陶也很有名。解放后在潍县、定陶、菏泽、高唐等地都有不少的汉代陶器出土，其中有大量的陶厨、陶灶、陶俑、陶磨、陶马、陶猪、陶鸡、陶狗等等。尤其是高唐县固河汉墓中出土的绿釉陶楼最为杰出，楼高 140 厘米，共分四层，结构十分雄伟，反映出汉代山东陶工的技术水平。北宋的德县、峰县、博山陶瓷都驰名全国。明清以来，博山又发展了玻璃业，博山的刻花碗、内花瓶、花球等产品，不仅为本国人民所喜爱，而且远销海外。

（三）

山东号称“齐鲁文明礼仪之邦”，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这里曾出现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

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在学术思想方面，为大家所熟知的首先就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孔子，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被后世尊为“至圣”。他的思想不仅支配了封建时代的中国，而且也给予东亚乃至全世界以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今天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战国时代，百家蜂起，邹人孟轲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后世称为“亚圣”。此外，还有鲁人墨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周是道家的代表，齐人邹衍、邹奭是阴阳五行家，齐人田骈、接子是信奉黄老的道家，齐人田巴是主张“离坚白，合同异”的名家。当时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百家争鸣的场所，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汉时期，山东是儒学发展的中心，西汉的五经八师，山东的经师有六人；东汉的五经十四博士，山东经师占了八家；附见于两汉书《儒林传》或有其他原因未被载入《儒林传》的当不下100余人，而其弟子尚不计算在内。其中最有名的是高密人郑玄，他遍注群经，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对经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后，如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人仲长统，唐朝博州清平人吕才、宋朝奉符（今山东泰安）人石介，清初济阳人张尔岐，都是著名的思想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春秋时代齐人田穰苴、孙武和战国时代齐人孙臆（孙武后裔）、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吴起，都是杰出的军事家。田穰苴的《司马兵法》、孙武的《孙子兵法》、孙臆的《孙臆兵法》和吴起的《吴起兵法》，都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重要著作，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春秋时代莱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晏婴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政治家。秦朝的齐方士徐福是中国最早的航海家、中日韩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三国时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亮，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物，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家。唐朝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刘晏既是政治家，又是出色的理财家。明朝抗倭名将蓬莱人戚继光，既是爱国的民族英雄，又是杰出的军事家。

在历史学方面，孔子编写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解释《春秋》的有鲁人左丘明写的《左氏传》，《左传》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在史学上有很高的价值。此后，如西晋平原高唐人华峤写的《后汉

书》、北魏东清河鄆县（今淄博市淄川东）人崔鸿写的《十六国春秋》、唐齐州（今济南）人房玄龄主编的《晋书》、清邹平人马骥（时称“马三代”）写的《绎史》、胶县人柯劭忞写的《新元史》等，都是重要的历史著作。（《新元史》问世较晚，1921年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把此书列入“正史”，合为“二十五史”。因系史学名著，故附列于此）

在文学方面，山东文学家辈出。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东）人东方朔是有名的辞赋作家。“建安七子”之中，鲁国（今曲阜）孔融、高平（今邹城西南）王粲、东平刘楨、北海剧县（今昌乐）徐干，在诗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西晋临淄人左思、左芬兄妹，刘宋东海郯人鲍照、鲍令暉兄妹，也都是当时比较有成就的诗人。齐梁时代东莞莒人刘勰写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和理论著作，对后代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唐、宋、元、明、清时期，山东的文学家更多，最有名的如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兗州人），北宋诗人王禹偁（菏泽巨野人）、晁补之（巨野人），南宋词人李清照（章丘人）、辛弃疾（历城人），元朝散曲作家张养浩（济南人）、杂剧作家康进之（棣州，今惠民人）、高文秀（东平人）、词人刘敏中（章丘人），明朝散曲作家冯惟敏（临朐人）、戏剧家李开先（章丘人）、诗人边贡（历城人）、李攀龙（历城人），清朝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淄川人，代表作《聊斋志异》）、戏曲家孔尚任（曲阜人，代表作《桃花扇》）、诗人王士禛（桓台人，著有《渔洋诗文集》）以及赵执信、赵慈父女（章丘人）等，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崇高地位。

在艺术方面，山东的汉画像石最为丰富，北魏至隋唐时期的佛像雕刻分布地区也很广，这些都是民间艺术家所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知名的画家有北宋营丘（今昌乐）人李成、东武（今诸城）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遗存于世），明代莱阳人崔子忠，清代济宁人焦秉贞、胶县人高凤翰等。山东现存的秦刻石、汉碑数量也很多，这些遗物在书法上都别具一格。知名的书法家如东晋琅邪临沂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泰山人羊欣，南齐兰陵人萧子云，唐代琅邪临沂人颜真卿等，他们的书法都是我国书法艺术的高峰。

在科学技术方面，著名的天文数学家有战国时齐人甘德（著《天文星占》8卷）、东汉东莱（今龙口）人徐岳（著《数术记遗》）、泰山蒙阴人刘

洪（著《律术记》）、曹魏临淄人刘徽（注《九章算术》）、晋清河（今临清东）人张丘建（著《算经》3卷）、刘宋时东海郟人何承天（改定《元嘉历》）、后周东平人王朴（著《钦天术经》4篇）、元东阿人李谦（著《古今历参校》）、清朝淄川人薛凤祚（著《天学会通》）、曲阜人孔广森（著《少广正负内外篇》6卷）。著名的农学家有西汉时氾水（今曹县）人氾胜之（著《农书》18篇）、北魏益都（今寿光）人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元朝东平人王桢（著《农书》37卷），他们的著作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号称中国四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名著。此外，如战国时代的鲁班（或谓公输班），是鲁国的巧匠，他善于建筑房屋和桥梁，改进生产工具，传说有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因此被后世奉为工匠之祖。东汉东莱人左伯是一位造纸专家，他造的纸精细有光，为书法家所珍视。北宋曹州人燕肃是一位著名的机械学家，他制作的指南车、记里鼓车和计时的莲花漏，经过实验，都十分精确。

祖国的医药学有悠久的历史，山东地方名医辈出，明清时期更是多如繁星，不可胜计。医学著述，也很丰富。最有名的有战国时代卢（今长清）人扁鹊，他采用四诊（望、闻、问、切）的方法诊断疾病，成为中医传统的诊断方法。西汉临淄人仓公（即淳于意）是第一个创立病历的医生。西晋高平（今邹城西南）人王叔和著《脉经》10卷，对24种脉象都作了详细的理论阐述。北魏阳平馆陶人李修主编《诸药方》100卷，收集了历代民间草方，又加上个人的医疗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药方汇编。北齐东莞莒人徐之才作《医方十剂》，把方剂分成十类，为掌握用药标准，治疗疾病，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后，如北宋临津（今宁津西南）人刘翰（主编《开宝本草》）、德州平原人赵自用（著《四时养颐录》）、郛州（今东平）人钱乙（著《小儿药证真诀》3卷）、金朝聊城人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论》）、明朝东平人高洞阳（著《十四经发挥》3卷）、益都人翟良（著《脉诀汇编》、《经络汇编》、《药性对答》、《本草古方讲意》、《痘科类编》等书）、清朝昌邑人黄元御（著《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伤寒悬解》、《金匱悬解》、《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痘科辑要》等书）、诸城人刘奎（著《瘟疫类编》）、历城人侯功震（著《痘疹大成》）等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医，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

山东人民不仅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而且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山东人民为了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曾经多次举行武装起义。举其大者，如秦朝末年有昌邑（今山东金乡）渔民彭越在巨野泽中聚众起义，后来在楚汉战争中成了佐助刘邦战胜项羽统一中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汉武帝时有泰山（治奉高，今山东泰安东北）、琅邪（治东武，今山东诸城）一带徐勃领导的农民起义。西汉后期有东郡茌平侯毋辟领导的农民起义、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起义。新莽末年有琅邪海曲县（今山东日照）吕母和莒县樊崇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赤眉大起义。东汉后期，山东沿海一带有张伯路、刘文河、周文光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泰山、琅邪一带公孙举、东郭寔、劳丙、叔孙无忌领导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青州又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主力失败以后，山东就成了当时农民革命的中心，青徐黄巾一直坚持斗争达20余年之久。隋朝末年有齐郡邹平人王薄据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南）首先发动起义；接着又有漳南（今山东武城北）孙安祖、窦建德、刘黑闥，济阴郡（治济阴，今山东曹县）孟海公，北海郡（治益都）郭方预，济北郡（治卢，今山东茌平南）韩进洛、甄宝车，齐郡（治历城）孟让，渤海郡（治阳信）孙宣雅，平原郡（治安乐，今山东德州）郝孝德，齐郡章丘人杜伏威、临济（今章丘西北）人辅公柘等的起义，山东的农民起义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卷起了一场农民革命的风暴，终于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唐朝末年有濮州（治鄆城）王仙芝、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黄巢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宋朝初年有沂州（治临沂）军卒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宋朝末年有郛城宋江领导的梁山泊农民起义（著名小说《水浒传》就是根据这次起义的传说写成的）。明朝初年有蒲台县民林三的妻子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明朝末年有巨野徐鸿儒在郛城领导的白莲教起义以及李青山、史东明等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等等。总之，山东的农民起义，历代皆有，次数最多，规模也较大，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全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山东人民不仅反对封建压迫，而且也反对民族压迫，他们往往是用武装

斗争的手段来解除这种压迫。例如北魏末邢杲在青州北海（今山东昌乐）领导的10万户流民起义；北宋末、南宋初，莱州“农家子”范温、梁山泊渔民张荣以及济南耿京领导的抗金斗争；金朝末年，益都杨安儿、杨妙真，泰安刘二祖、彭义斌等领导的红袄军反金起义；元朝末年，毛贵、田丰领导的山东人民反元起义；清朝初年，青州赵应元、秦尚行、淄川谢迁、胶东于七、鲁南王俊领导的抗清斗争，宫文彩领导的嘉祥满家洞军和任七、张七领导的曹州榆园军等的抗清斗争；清中叶以后的寿张王伦、乌三娘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一支）起义和金乡、定陶、曹县等地的天理教起义，都显示了山东人民不甘忍受民族压迫而英勇斗争的革命气概。此外，由于山东地处沿海，为了反抗倭寇的侵掠，山东人民还在蓬莱人戚继光、益都人邢玠领导下，进行了御倭和援朝的战争，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封建制度日益腐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处于清朝统治“腹地”和祖国东方门户的山东人民，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上反封建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一方面又为反对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举其大者，如运河两岸的幅军农民起义，鲁西北的黑旗军农民起义，以及遍及全省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这些斗争都给了腐败反动的清皇朝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灭亡。与此同时，山东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反租界斗争、反筑路斗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直至发展为震惊全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从而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是由山东问题引起的。山东各界人民的斗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这次伟大运动的前驱。在此期间，王尽美、邓恩铭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首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并于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山东成为全国建党最早的省份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人民为反对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先后在阳谷、高唐、博兴、益都、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胶东等地举行了武装暴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人民又先后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寿光牛头